引　言

两千多年以前，我国历史上，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的时代。它宛如簇簇晨星闪烁着文化的光芒；它又似道道曙光为学术思想带来了蓬勃灿烂的景象。这就是我国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互相讨论自由争辩所形成的“百家争鸣”的盛况。那时，齐国的稷下学宫，正就是这个光辉局面最为具体的显现。

稷下学宫，是战国时期齐国容纳各个不同学派，进行学术思想自由研究讨论，参与政治议论，备齐王咨询、顾问的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机构。它具有今日国家科学院、研究所和政府的议政院、国家元首的“智囊团”的这些特点。它不但为齐国的政治和学术研究工作，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并且对当时的列国和后世的学术思想、政治制度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。

稷下学宫，它是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为祖国的文化做出了综合整理、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会贯通的工作，形成了祖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合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诸子一百八十七家的四千余篇书籍中，就有不少篇章出自稷下学士之手。但它的本身却伴随着齐国的灭亡而结束。也同齐国的命运一样，首先遭到的就是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破坏，继而则是秦始皇的“焚书”，因而，它为后世留下来的东西比当时的成果要少得多。复因年代久远，零落散佚，在今日研究这个有着广泛领域的齐文化，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，也有其一定的难度。现在为使人们知其梗概，除邀集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，对稷下学宫的建立和昌盛，以及它的内涵和政治作用做探讨性的论述，出刊本辑，以为研究齐文化的发轫点，并希望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，借以引起大家的重视，为今后齐文化的研究、整理工作，起一点推动的作用。

一

齐国（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二二一年），自太公始封，至秦灭齐，约八百余年。这期间出现过不少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化工作的开创、传播者。总的说，首先是

开国的姜太公，他奠定了这个泱泱大国的根基；再就是管仲，他辅佐齐桓公，改革内政，尊王攘夷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创造了煌煌大业。这是两位最为杰出的人物，其他荦荦大者，亦复不少。

姜太公，辅周灭商，功业彪炳，他“修德政以安内”（《说苑·地理》），“迁九鼎，修国政，与天下更始，师尚父谋居多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，这都是正史对他功业的肯定。他因功封于齐，到齐后，他因地制宜，简化礼仪制度，尊重当地居民的旧有风俗，齐国滨海，就发展渔业和盐业，又大力提倡手工业和商业。即所谓：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渔盐之利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显示了他“治天下有余智”的超人才能，周公曾为之赞叹说：“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，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”（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）。因之“海（东海）岱（泰山）之间，敛袂而往朝焉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，“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太公为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，所以齐始终国力强盛，在春秋

时期能够首先称霸，战国时期也是七雄之一。

太公又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军事家，中国最早的兵书《六韬》，据说是太公所著，而被称为兵学的鼻祖。据史书记载，周武王奉文王遗命，尊太公望为师，称之为“师尚父”，他在牧野一战，以弱制强，以寡击众，消灭了称雄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商代。所以被称赞说：“其事多兵权与奇计，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者，皆尊太公为本谋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《大明》一篇，就是描写和赞颂太公“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”，当时指挥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况。

管仲任政，辅佐齐桓公，进行了全国政治改革，“连五家之兵，设轻重鱼盐之法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，齐人皆悦”（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），他分国都为十五个士乡和六个工商乡，分鄙野为五属，设各级官吏管理，并以士乡的乡里组织为军事编制，更设有选拔人才制度，以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，适当征发力役，禁止掠夺家畜，并用官府力量，发展鱼、盐、铁业，铸造和管理货

币，调剂物价，从而国力大振。他“以区区之齐地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，故其称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（《管子》曰礼、曰义、曰廉、曰耻）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源，合顺民心。”在政令上主张“论卑而易行，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”（《史记，管晏列传》）。由于这些改革措施，确立了桓公称霸的条件，而且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革，管仲之力也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这都是孔子给他的高度评价。

晏婴，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“事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力行重于齐”，对当时的政治风气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改进作用。孔子在齐，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，晏婴进曰：“今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他反对孔子迂阔，繁文褥节，认为用孔子的办法以移齐俗，“非所以先细民也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他所谓“细民”就是平民百姓，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切要为平民百姓着想，所以他在庄公被杀时，表示了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”的观点。他的轶事很多，有《晏子春秋》一书传世。

另外，田穰苴，晏婴荐其“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”，因为大司马，故称司马穰苴。齐威王时，“用兵行威，大放（行）穰苴之法，而诸侯朝齐”。齐威王使大夫追述古者《司马兵法》而附穰苴于其中，因号称《司马穰苴兵法》。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司马兵法》宏廓深远，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”（《史记·司马穰苴列传》）。孙武子，齐人，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（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），《正义》魏武帝（曹操）云：“孙子者，齐人，事于吴王阖闾，为吴将，作兵法十三篇”。《孙子兵法》在军事学史上地位极高，在公元七世纪时传到日本，十八世纪以后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，又先后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捷、俄等多种文字，直到现在还是军事学的经典著作，内容包含着相当高明的辩证思想。孙武子的后世子孙孙膑，亦有孙膑兵法传于世。这几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，均出自齐国，而囊括了我国军事学的权威著作，影响于古今中外。

文化方面，堪以称道者，亦复不少。如孔子于公元前五一七年来到齐国，听到当时几近失传的“韶”乐，以致废寝忘餐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而说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中国第一部诗歌选集《诗经》，曾选录了齐国民歌十一首，称为《齐风》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载，吴国的公子季札，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在公元前五四四年，到鲁国观乐，他听了各国的民歌演奏，都一一做了评论，他听了《齐风》的演奏后，称赞说：“美哉！泱泱乎，大风也哉，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，国未可量也”。从季札的评论中，我们知道《齐风》旋律优美，气魄深远宏大，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的明朗、豪壮特色，所谓“审乐以知政”，因之，得出“国未可量”的结论。无怪，太史公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的总评中说：“吾适齐，自泰山属之琅邪，北被于海，膏壤二千里，其民阔达多匿知，其天性也。以太公之圣，建国本；桓公之威，修善政，以为诸侯会盟，称伯（霸）不亦宜乎，洋洋哉！固大国之风也！”

二

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，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时代。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旧的统治阶层由新兴的封建势力所取代，韩、赵、魏三家大夫瓜分了晋国，形成了三个新的国家；齐国的田姓大夫也篡夺了姜姓的王位。原来世袭的大臣，也被聚财养众拥有实力的下属所代替，整个社会阶级紊乱了，传统的政治道德，伦理法则也都被历史潮流所淘汰了。在思想意识方面，新的认识层出不穷。国与国之间，征战频仍，民不聊生，陷于政治、军事上的极端混乱。占据王位的和有野心的大臣，为了巩固他们的既得权位和维护他们的现实利益，不得不笼络人才培植势力，因而形成了“好客”、“好士”的风气，这样“尚贤”的要求提出来了，尚贤就是推尚贤才，唯才是用。在春秋中期以前，所谓尚贤、举贤，也只限于贵族集团内部，即“内姓选于亲，外姓选于旧”（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）。孔子率先提出了“选于众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、“举贤才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、“举逸民”（《论语·

尧曰》）的政治主张，墨翟也相继主张“尚贤”（墨子·尚贤上》）。这样凡是有才智本领的人，不论出身贵贱，都可以平步青云受到重用，出现了一个大家机会均等自由竞争的大解放时代。这些有才能被选用的人，当时都统称为“士”。本来士是封建制度里最末的一级，但这时候，“士”就成了有才能的人的称号了，并发展成了一种自由职业。以后他们居然开门授徒，扩张声势，除了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，不免又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，来议论当时的文化和制度。因而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，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，各“思以其道易天下”。诸子百家就是这样兴起的。这就促进了思想的发展，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空前活跃的时代。也就是我国学术史上所说的“百家争鸣”。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兴起，并且具体显现了这一境况。

三

百家争鸣，这个学术思想自由争辨的盛世。在秦始皇建立了大统一的封建专制帝国后，为了巩固他的政权，除了“车同轨，书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同文”一切制度的统一外，随之要求政治思想的一致，首先是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，继之是汉武帝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于是学术自由从此被扼杀，学术思想和社会发展也因之陷于停滞。直到一九一九年，才有北京学术界的“五四”运动发生，倡导“新文化”，大声疾呼民主与科学，但争取学术自由的要求，终未得到实现。

建国后，一九五六年二月，在毛泽东同志的居所颐年堂开会，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一九五七年二月，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（扩大）会议上宣布了这项决定。特别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随着全面体制的改革这个关系我国人民政治生活、思想理论、文化艺术的战略方针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，新的形势。今天，我们在党的“双百”方针的指引下，来研究、整理那象征着“百家争鸣”的稷下学宫给我们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它的影响与作用，实有着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四

历史学这门学科，现在也和其他学科一

样，面临着怎样适应现代化建设步伐问题，怎样满足社会需要问题。历史学能够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，似乎不太明显，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，却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。本来精神与物质两者是相互融通很难截然分开的，有些东西表面看是属于物质的，但其内涵则有绝大部分是精神的产物。很明显的象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其他如人民的道德修养和审美观念，创造和发明等等，都可以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借鉴。一个国家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，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尤其是在知识爆炸，信息畅通，各种学科多向联系的现代社会，文史研究决不可能停留在孤立的状态，而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方法。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整理工作，除了采取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之外，还应该适应新的形势，采取新的方法。

首先是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的结合。过去的历史学者，研究先秦史时，大多重视文献史料，而忽视地下出土的文物；而许多研究古文物的学者，又往往受旧金石学的影

响，不能结合社会历史进行研究，这样就不能使出土文物与文献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就以研究战国时代的历史来说，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是《战国策》一书，这固然是由于它有其他资料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，但终究它还是有些不足之处，如当秦始皇下令焚书“史官非《秦记》皆烧之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时，大量的六国史料随着秦始皇的一炬而灰飞烟灭。《战国策》一书，所收集的只能是些侥免于难的断简残篇，一直到西汉末年刘向综理编订时，已经是过了将近两百多年，到宋代该书已有缺佚。所以战国时代的史料，能流传到今天的十分有限。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看，就很明显地看出他在这方面史料的贫乏。以后甲骨文和金文的出土，才为研究商、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，填补了只凭文字记录研究的缺陷。新中国建立以来，考古学家用科学方法，发掘了大量的出土实物，如一九七二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书残本，如《吴孙子》（即《孙子兵法》）、《齐孙子》（即《孙膑兵法》）、《晏子》（即《晏子春秋》）、《六韬》（即太公《六韬》）等原为后人怀疑的古书，获得

了有力的佐证，并且有些是长期失传的重要佚书，有的是尚有传本的古书最古的抄本，这些自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我临淄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这些年来也出土了一些西周与春秋、战国时代的铜器铭文等实物。这样，出土文物的历史资料对古籍研究整理的重要性，就更为突出了。相信，我们对齐文化的研究整理，这样地配合起来，一定会有新的发现，新的成就。

再就是采取搞活与开放的方法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全面改革，首战告捷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，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，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。研究整理历史资料、繁荣学术、丰富理论，也应该采取搞活和开放的方法。学术和理论的搞活，就是解放思想，开阔思路，大胆探索，自由讨论；学术和理论的开放，就是了解多方面学术和理论的新信息，不闭目塞听，注意输入，顺应时代的进步和形势的发展，不时吸收新的东西来充实、丰富已有的理论。通过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和争辩；通过事实证据，求取真理，这样真理才会愈辩愈明，理

论才能因之而丰富而发展。譬如《孙子兵法》，已作为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，在学术界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，被运用于现代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实践上。“商战如兵战”，融通信息，分析行情，用计设谋指挥生产竞争，“兵贵神速”、“决胜千里”和商战中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，实在都有些相通之处，这就是一个学术思想搞活运用的例证。

总之，历史学的繁荣兴盛——齐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，它既离不开社会的条件，也要靠广大史学家的努力。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，只要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求实精神，就必定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果，使“古为今用”，给旧的文化赋以新的精神面貌，并让它发扬光大，为“四化”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；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贡献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

稷下学宫

王志民

稷下学宫，是战国时期齐国在其都城临淄建立的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大学堂；是战国之世闻名列国的学术中心，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一、发展概略

从现存历史资料探讨，稷下学宫基本与田齐政权相始终，兴办于田齐桓公（田午）之时，随齐威王的政治、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发展壮大，至齐宣王时视为鼎盛，湣王后期一度衰落，襄王时再度中兴，齐王建时逐渐衰败，及秦灭齐，学宫结束。由始至终，大约一百五十年左右，其创办时间之长，规模之大，影响之深远，不仅为前代所未有，也是整个古代教育史上所罕见。

稷下学宫始建于何年，正史并无是项记载。东汉末学者徐干（建安七子之一）在其

著作《中论》中写有："齐桓公立稷下之宫，设大夫之号，招致贤人而尊崇之。"因此，后人多以学宫创建于齐桓公（午）之世。桓公在位十八年（公元前三七四年至公元前三五七年），这时，田齐政权刚刚建立，百废待举，稷下学宫也属草创，发展规模不会太大。桓公之子齐威王在位三十七年，他在政治上，广开言路，整顿吏治，锐意改革。结果，国家振兴，经济繁荣，出现大治景象。与此同时，威王采取开明的文化政策，发展稷下学宫，广泛招纳贤士，国内外学者纷纷来稷下讲学，形成初步兴旺的局面。刘向《新序》载："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，邹忌既为齐相，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。以为设以微辞，邹忌必不能及，乃相与俱往见邹忌……"。邹忌为齐相，正是威王之时。由此可见，这时稷下先生已相当多，且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，对国家政治产生很大影响。

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是齐宣王时，（公元前三一九年至公元前三〇一年），这时，齐国富兵强，达到鼎盛时期。宣王也雄心勃勃，"欲辟土地，朝秦、楚，莅中国而抚四

夷”（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，也就是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。为着这种政治的需要，宣王不惜化费大量资财，扩大学宫规模，建筑高门大厦，又实行宽厚的政策，鼓励百家争鸣。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历史著作中，记载了很多宣王与稷下学者会见、议对、辩论、宴请、馈赠的事迹，都足以证明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”（《史记·田齐世家》）。于是各国来讲学、游学的学者及弟子络绎不绝，人数多至数千人。各派学者在这里开展各种讲学活动和学术论争，稷下成为闻名于各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和百家争鸣的园地。

齐湣王（公元前三〇〇年至公元前二八四年）继宣王之后当政。其初期，稷下学宫仍很兴盛，并有继续发展扩大的趋势。但湣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，对内不任贤才，对外用兵不休，而且拒绝稷下先生的劝谏，使他们很感失望，慎到、接子、荀况、田骈等著名学者纷纷离开稷下，乐毅率五国之兵攻入临淄，湣王逃亡至莒被楚将淖齿杀害，学宫也遭到破坏而停顿。

湣王之子襄王（公元前二八三年至公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